

德租日占时期青岛殖民教育研究(1898—1922)

辛佳宜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德占时期和第一次日占时期,为了对青岛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日德两国殖民当局都对青岛的教育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以期为侵略活动服务。但在不同的文化政策指导下,两国在青办学形式、授课内容和影响都有所不同。德占时期主要由总督府和基督教会承担教育活动的开展,教育内容涉及宗教、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客观上推动了青岛教育近代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第一次日占时期日本殖民当局为青岛中国人教育活动主导者,借助公学堂和日语学校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虽然日德两国殖民当局在不同文化政策指导下,实行不同的教育活动,并造成教育活动效果的差异性,但其实质都是为殖民统治服务。

关键词:德占时期;日占时期;青岛;殖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3-0048-08

德租日占时期,德占当局和日占当局都严格管控青岛的教育活动以为其殖民侵略服务。但是德日殖民当局奉行不同的文化侵略方针,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存在差异,使得不同时期青岛中国人教育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特点。本文拟通过对德占时期、第一次日占时期青岛中国人教育状况进行比较,探究不同殖民政权统治下青岛殖民教育特征的异同。

一、德占时期青岛中国人教育发展状况

1897—1914年为德国占领时期。在这17年里,德占当局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领域都进行了相应建设,“先后开办了26所蒙养学堂,10余所教会学校,4所职业学校和1所特别高等专门学校”^{[1]145}。兴办学校的主体为德占当局和德国在青岛的传教会,后者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得到了前者的许可和支持。此外,一些德国工矿企业也开办了职业教育培训班,意在为其在青岛的工矿企业培训合格的中国工人。

(一)德占当局主导开办的中国人学校

德占当局主导在青岛开办的中国人学校主要提供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不同种类的教育内容。

基础教育方面,德占当局通过建立蒙养学堂对青岛中国人开展小学教育,共建学堂26所。这种被称为“蒙养学堂”的官办小学是德国殖民者借清政府大兴近代教育改革之风推行殖民地文化政策的产物,也是德占当局利用中国传统教育机构为德国文化政策服务的实践。1905年,一份胶澳总督府的文书写道:“要使学校教育全面地向中国人的品格施加影响,要使它成为这样一种手段,借助于它,德国的知识和德国的手段可以被贯彻到全省,贯彻到经济上依赖青岛的腹地之中。”^{[2]62}为了能够对青岛中国人“广其教育”,1905年2月,总督府“在台东镇和法海寺各试办了一所中国小学校。免费的课程包括中文(读和写)、算术和一点地理课”^{[3]370}。这次试验效果不错,1906年,这两所小学校的在校学生数分别达到33名和31名,与前一年相比学生数量增加了一倍。至1914年,这种小学校已经增至26所,除前面提到的两地外,李村属境内的宋哥庄、灰牛石、九水埠、登窑、赵家庄以及青岛境内的宝岛、薛家岛、北庄等地皆有分布。学校办学经费由总督府负责,后来由于入学需求大增,蒙养学堂办学经费不足,总督府通过在保护区(德国强租胶州湾后,德皇颁布敕令,宣布将胶州湾置于其保护之

收稿日期:2020-12-09

作者简介:辛佳宜(1995—),女,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下,德国政府据此改其名称为“胶州湾保护领”)增加中国人税收才解决这一问题。蒙养学堂学制5年,“与我国学制不合”^{[4]4},是中德学制折中的

产物。学校按照由浅入深的原则进行教学,其主要课程安排如表1所示。

表1 蒙养学堂课程及课时数^[5]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课程	每周课时数(小时)								
修身	2								
国文	9	国文	9	国文	9	国文	7	国文	7
算学	9	经书	7	经书	7	经书	7	经书	7
地理	2	算学	6	算学	6	算学	4	算学	4
博物	2	地理	2	地理	2	地理	2	地理	2
		历史	2	历史	2	历史	2	历史	2
		博物	2	博物	2	博物	2	博物	2
						德文	6	德文	6

从表1可以看到,蒙养学堂的课程安排融合了中国传统课程和近代西方课程的内容。从课时比重来看,并非中西方课程平分,而是中国传统课程课时(修身、国文)偏多,但是德语的学习任务也并不轻松,“惟学习德文必在其四五两年盖量其力而施也”^{[5]205}。在四五学年中,德语课时约占总课时的1/5,由此可见德语学习在蒙养学堂课程中的重要性。蒙养学堂授课老师由中德两国教师担任,其中中国教师多是已经接受过德国文化熏陶的神学院毕业生,教材由总督府免费提供。除了基础课程的学习,蒙养学堂还设置了职业培训课程作为补充。“作为对基本教学的补充,学校还通过夜间加课等方式对指定学生进行进一步培养,并通过使其接触一些工矿企业、医院、林务局等场所获得职业培训。”^{[6]18}

除了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德占当局还十分重视职业技术教育,这些职业培训是应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总督府于“农事试验场附设农学校、林务局内附设林学校”^{[7]98},以此进行农林知识培训,修业期限为3年。青岛船坞工艺厂开办的职业教育培训可谓德占时期工矿企业开办职业教育培训的代表。1902年,因繁忙的业务和外地招募工匠的费用较高,德国海军造船厂产生了“是否可成功地从山东本地人中培训工匠,他们工作好且工资要求不高”^{[8]429}的想法,“使自己尽可能地不再依赖其他地方的工匠”^{[8]429}。以这一想法为出发点,同年4月,船厂开办徒工学校;同年10月,发布招生告示,招生告示对招生要求颇为严格,必须是山东籍,年龄自16至19岁,身体健康、相貌魁梧,同时必须有中国殷实商铺作保,本人要有一定的中文读写能力。在校期间的

作息管理非常严格,每周学习6天,以半工半学的方式进行,每日学习和做工总时长为12小时甚至更久。为保证学习质量,学徒食宿皆在船厂(工厂为这些学徒建立了徒工宿舍)。课程安排主要有早上德文的读、写、计算和工程教学课,晚上上中文课,其余时间都在船厂的车间进行技能培训。学制四年,期满后进行考试,考试内容包括手艺能力、德文和中文课知识,考试合格发给文凭。根据合同,学习期满后,学徒仍要为船厂继续工作数年。因其半工半读的学习模式,船厂给学徒发有工资,如表2所示。

表2 船厂学徒工资表^[8]

学年	日薪(银元)
第一学年	0.2
第二学年	0.25
第三学年	0.3
第四学年	0.35

学徒乃至学成之后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当时从中国其他地区招募的工匠工资——这与船厂起初开办职业培训的期待相一致。这一职业培训收效可观,从1902年到1908年,招收学徒数为490人,其中满师徒工部分成为了船厂的技术骨干,担任队长、仓库管理员、书记员等职务,部分在内地矿山、铁路和建桥公司担任工长或翻译,还有一部分自己建立了小工厂单干。鉴于此种成效,德占当局肯定了职业培训的意义,认为这种模式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并值得进一步推广。

山东铁路公司实行职业培训的尝试开始得更早,甚至成为青岛船坞工艺厂效仿的对象。为了培养中国籍铁路员工,山东铁路公司委托青岛传教会于1899年秋开设了训练班。结合实地学习

开设了德文、算术、发报以及营运和车站业务规程等课程。由于战乱的影响,这一学习过程于1900年一度中断,到了1901年学员人数恢复至20人,1902年合格学员被山东巡抚周馥授予站长、列车长等职位。1900年,山东铁路公司在四方兴建四方铁路工厂,1904年四方铁路工厂创办学徒养成所,每年招收40名学徒进厂学习,学习内容涉及机械制造、工程管理等课程。每日进行两小时职业课程学习,由德国老师用德语传授,此外,学徒还需要每日进行两小时德语学习。其余时间则跟随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在厂实习。徒工学校学制四年,学成期满后仍要为工厂工作2年。

位于沧口的德华丝厂也开办了徒工学校,目的是培养能为其独当一面的纺织工人。建厂之初,工厂就开始从签订长年合同的男童中进行选拔,教授德语、读写、算术、地理、中文,并使其在所有生产部门接受训练,直至成为熟练工人。为了能让这种职业教育更为有效地施行,德华丝厂甚至投入大量资金在公司建造住宅供学徒居住。纺织工人这项工作对于世代以务农为生的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因此这一培训过程极为缓慢。但“从实际情况说明,一大批工人已经认识到不再把工厂工作看成是副业……而看成是维持生活的保证”^{[3]498},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也来自职业培训的效果。

这些职业教育活动创办目的主要是为当地培

养合格工人,为德国殖民当局在青岛的工业发展提供优质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学校的培养模式大抵相同,大都采取半工半读的模式,并为学徒提供住宿。除了开设职业课程,也会设置读写、算术和德语等基础课程。对于德占当局来说,兴办徒工学校的目的得以实现,而对于近代青岛来说,这种职业教育客观上为青岛乃至整个山东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

德华大学是德占当局在青岛开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机构。这是一所直属于清政府学部和德国海军部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目的的高等学府。这所学校的创办源于德国驻华公使雷克斯——一位积极文化政策的拥护者。他认为应通过创办一所大学把德国文化传播到全中国,以此来消解中国人对德国用武力占领中国领土的不满,进而使德国的工业和商业获得收益。在此目的的推动下,德华大学于1903年开始筹办,并与清政府商定为中德合办,开办经费为64万马克,德政府出资60万马克。德国人出任首位监督,中国人任总稽查。1909年10月25日,德华大学正式开学,其正式名称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学校设预备科和高等科两个阶段,预备科学制5年,主要教授基础课程;高等科分为法政科、医科、工科、农林科四个专业,学制根据专业3到4年不等。学校课程安排见表3。

表3 德华大学课程设置^[3,5]

初级部	德语、历史、地理、数学、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化学、速写、体操、歌唱等	
高级部	法政科	德语、英语、国际法、一般国家与行政法、铁路—矿山—海洋法、国民经济学、财政学等
	工科	德语、数学、物理、化学与电学、力学与材料力学、矿物学、地质与矿层学、矿业与冶金业、机械制造学、铁路建设及相关科目、电学与电力技术等
	农林科	德语、农艺与植物学、动物饲养学、农业机械学、土壤学、肥料学、有机化学、土地测量学、动物生理学、饲料学、林木学、兽医学
	医科	德语、解剖与组织学、生理学、比较动物学、化学、物理学、植物学、拉丁语

预备科中文课程占比最大,德文次之,但科学类相关的科目全部以德文教授并以中文辅助理解;高等科除课堂上的理论学习,还会根据专业进入法院、医院、农林所、船厂等不同机构进行实习。学生学成之后可继续深造,也可分配工作。师资力量较为雄厚,老师由中德两国教师担任,德国教师占大多数。学校拥有较为先进的仪器设备,并设立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富有成效的译书局——由德华大学的老师翻译中德书籍。学校学费不菲,报名入学者众多,在校学生数量最多时达到400余人。

(二)教会学校

德占时期,其传教会也是在青岛兴办教育的重要力量。当时在青岛的德国教会组织主要有3个:柏林信义会、天主教圣言会、德国同善会。传教会兴办教育的活动较之于德占当局开始的更早,如柏林信义会在占领之初,就“开始在一所学校里为年轻的中国人上课,为他们提供学习德语的机会”^{[3]11}。殖民当局对此也大力支持,“在广大地区的所有传教使团为华人开设的学校和医院一律减免所有赋税”^{[3]144}。除了开展教育,教会学校还承担着传播宗教的责任,这使其与官办学校

在教学内容存在些许不同,教会学校主要以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发展重点。

在基础教育方面,柏林信义会在青岛共建立了11所小学、1所中学和3所女子学校。小学的课程主要涉及中国古文、初级德语以及德国学校中的基础学科。德华中学开办于1899年,1904年学校设4个年级,开设课程有讲经、汉语作文练习、德语、地理、历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物理、商业簿记、几何学、博物学(生物学)、物理学(热学)、德文、宗教信仰、体操和唱歌,相当于德国的中学程度。德华中学的生源来自于保护区和山东内地,有毕业生曾在科举考试获得“中国一等举人”的好成绩。3所女子中学是青岛女子教育的先行者,皆由修女索艾尔创建。她将宗教课和中文课的学习贯穿整个学习过程。在1906年的学习计划中,初级部学制为4年,开设课程有数学、历史、地理、手工,高级部学制5年,始设德语课程。

圣言会特别重视“德语占重要地位的华人学校”^{[3]300}。截止到1911年,圣言会在青岛保护区建立了8所小学、2所中学以及一所师范院校。小学有5个年级,学习免费,主要教授汉语、算术、地理和自然知识。1900年,圣言会开办德华男童学校,起初有学生30人,分小学、中学二级^{[4]3}。1906年,学校开设了德文、中文、算术、地理、物理、绘画和体育课程。1905年,圣言会的修女们为家境殷实的中国少女开办了一所寄宿学校,称为华人女子中学。每天除了学习一般课程,同样需要学习德语课。1912年,另一所华人女子中学建立,这是一所专门为富裕家庭出身的中国女孩设立的学校。其课程主要包括女红、写作、宗教伦理、语文、绘画、地理等,二年级设立德语课,四年级设立英语课。1911年,圣言会还创立了女子布道学校,学生接受音乐、算术、手工、教堂洗礼等课程教育。

同善会在青岛极少发展教徒,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教育活动中,先后创办了2所小学和2所中学。1901年6月,同善会主持工作的传教士卫礼贤在大鲍岛为中国人专门创建了语言学校——德华神学校(也被称为“礼贤书院”),意图是为了“培养学生掌握良好的中国古文知识,还尽可能地教他们全面的德国学校课程”^{[3]145}。为了能在“坚实的中国文化和足够的德语、算术和地理知识的基础上以双重的方式培养学生”^{[3]199},该学校

的教学内容分为两个门类:一是商业—技术部,主要教授算术、公文写作、会计等课程,以实用知识教育为主;另一个为科学部,主要教授自然和人文科学。礼贤书院的学制与当时中国官方保持一致。随着书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此学习,其中大部分来自省内的官宦人家。德占当局因此认为“这是德意志文化大增的表现”^{[3]299}。

德华大学建立之后,为了填补总督府小学和德华大学之间的教育空白,礼贤书院进行相应调整,使其课程设置不与德华大学重叠,从而有效地填补了上述两者的空白阶段。除了创办礼贤书院,同善会1901年还在台东镇、高密两地开办小学校,1908年于圣言会馆附设德华小学校。女子教育方面则于1904年建立美懿女校,教授中国女子中文、德语、算术、地理、生物学、图画、音乐等基础课程及家政、缝纫等实用性课程。这一女子学校后发展成为淑范女校,其课程设有中文、德文与实学。其中实学包括中德地理、植物、动物诸学——这些课程可由中文教授。高级班理化学、算学、代数、几何等课程则由德文教授,并使女生了解德国历史社会文化。除了以上课程,淑范女校还为在校女生开设了体育、女红、乐法、抚琴以及仿照中国官办女学堂开设德育法(即道德教育)等课程,令“女学生皆备有活泼自由之灵性”^{[5]236},可谓在女子教育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除了从事基础教育,传教会还兴办了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1899年圣言会受山东铁路公司委托开办铁路学校,进行铁路业务培训。学习期限不超过一年,学习德语、算术、电报技术和铁路业务^{[9]270}。在这里学习的学生由教会传教站提供膳食,并由铁路公司支付费用。该铁路学校的培训效果显著,“目前,几乎所有在各火车站工作的年轻人都是由这个学校培训出来的”^{[3]145}。同时圣言会的传教士也会教授中国职员德语,并对中国青年教徒进行技术培训,使其能到传教会开办的印刷厂和书籍装订厂工作。20世纪初,圣言会依托女子中学开办了华人女子手工学校,该校的主要工作是传授牢固的基督教信念和女性日常劳动技能^{[6]30}。柏林信义会也在台东镇设立了名为“女子编织学院”和“女子工业学校”两所女子手工学校。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教学方面注重技能培训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二、第一次日占时期青岛中国人教育发展状况

1914—1922年为第一次日占青岛时期。这一时期,青岛处于日本军方的直接统治下。作为侵略方针的重要一环,日本殖民当局设立公学堂和语言学校作为青岛地区中国人教育的主要场所,以确保教育为其殖民统治服务。

1914年日本出兵占领青岛后,建立了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守备军司令部,下设军政署(1917年改组军政机构后于民政署下设学务系)作为青岛教育活动的管理机构。该机构既承担管理青岛日侨学校的任务,亦负责对青岛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内部人员均由日本内务部直接派任。1915年,日本守备军当局逐步将德占时期为中国人开办的26所蒙养学堂改为“公学堂”。1922年日占当局又在青岛地区台西镇、双山、夏庄、张村、现化庵、仙家寨、黄埠、湛山、大麦岛、辛家庄、浮山所等地增设了11所公学堂。至此,青岛地区公学堂达到37所,在校学生3356人。关于公学堂的设置目的,时任民政署长官秋山雅之介曾在传记中有所表述:“通过在山东建设精神上物质上的正式工程,使归还论事实上无效,使山东本身永久与日本接合。”^{[10]82}日本人在青岛建立的公学堂大多由旧私塾改成,校舍原先是普通农舍、祠堂和庙宇,规模小、设施简陋,师资水平不高。1917年日本守备军发布公学堂规则,即针对当时青岛中国儿童的教育方针,规定:公学堂为注意儿童身体的发育,实施德育,并传授其生活所必需的普通知识技能的场所。公学堂内开办的课程有修身、中文、日语、地理、历史、算术、理科、体操、图画手工、农业、商业(女生加上缝纫),授业年限为5年。附设于公学堂内的实业学校,则教授修身、实业(工农业)、中文、日语、数学、实习等课程^{[11]46}。具体课程安排是:五个学年都要学习的科目有修身、中文、日语、算术、唱歌、体操、图画、手工。修身课的学习内容在第一、二、三学年均为道德的要旨,四、五学年则在此基础上添加《论语》讲授。中文和日语课的教学内容均为读法、写法、作法、语法。算术课前两个学年只学习算术,在第三学年加上珠算,第四学年学习小数、诸等数和珠算,第五学年学分数、百分算比例、珠算。图画课学习简单形体,手工课学习简易手工。唱歌课学习单音唱歌,体操课的学习内容分为游戏

和普通体操。除此之外,第三学年开始增设缝纫课,学习普通衣服的缝补和补缀法。第四、五学年又增设农业和商事课,分别学习农时、森林和商业的基础知识。在课时分配上,语言学习和算术占据绝大部分课时,计占总课时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课程的分配则要求“图画、手工、缝纫、农业、商业应当分配适当的教学时数,其中的一科或者数科可以减少适当的教学时数”^{[12]538}。公学堂的课程设置虽然涵盖了近代基础科学知识,但其殖民教育的特征却十分突出。公学堂学科程度和教科书(除日语读本外)与当时中国内地的国民学校相同,其日语读本采用的是南满洲铁路附属地教育研究会编纂系编排的日语读本。假期方面,公学堂除安排祝日、祭日、周日休息和基本的暑假、春假外,还包括青岛开城纪念日(11月7日)。这对于在公学堂就学的中国学童来说,无疑是一种民族耻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公学堂本身所具有的殖民色彩。公学堂在日本殖民当局许可的范围内附设有实业学堂,以此承担对中国人的职业教育。修业年限为三年,设置学科为修身、农业或者商业、日语、中文、数学、实习,并成为公学堂毕业生继续学习的场所之一(另一场所为李村特科学校)。

公学堂内的日语老师由日本人和中国人分别担任。青岛、李村、台东镇、台西镇四所“模范学堂”由日本教师负责日语教育,其他公学堂的日语课程则由满洲公学堂的毕业生负责教授。由此可见,青岛公学堂的日语教育、教科书乃至教授日语的中国教师都受到了满洲的影响^[13],这些反映了日占青岛当局采取的针对青岛中国人的教育方式本质上是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殖民教育方式的移植。

日语教育不仅是日占当局对青岛中国人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也是实现使青岛中国人服务日占当局的必要环节。因此,除了公学堂将日语设为主要课程“以养成转为日人服务之人才”^{[2]127}外,日占当局自1918年起还在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设立了5所日语学校,专门接收中国学生,总计354人接受了日语教育^{[14]35}。青岛日语学校“设青岛公学堂内,夜间授课,学制2年,共有教师5名,280名学生,成绩良好”^{[11]49}。同年筹备开设的还有李村日语学校、坊子日语学校和张店日语学校,1921年又在青州筹设了日语学校。日语学校的教师多为青岛日占当局民政署官员。

1916年,为了培养殖民统治所需教员和官员,日本殖民当局创建李村特科学学校。该学校附设于李村公学堂内。学习时间为22个月,分为三个学期。休息日除公学堂固定假日外增设民国创立纪念日。这是日占当局鉴于招收学生大多为成年中国人,以此博得中国人好感,但是与青岛开城纪念日共同作为休息日来纪念,不免充满讽刺意味。李村特科学学校教学科目有日语、算术、地理、历史、理科、图画、唱歌、体操、中文及教授法,除了中文科目外,其他各科全部采用日语授课,日语教学在总课时中占有很大比例。特科学学校的招生标准要求具备公学堂毕业学历或同等学力,年龄限制在18—25岁之间。这所“其意在造成小学师资”的特科学学校“唯办完一班既已停止”^{[4]3}。第一届毕业生全部成为公学堂教员、宪兵队通译及李村出張所雇员。除了上述学校,第一次日占青岛时期承担中国人职业教育活动的学校,还有1915年开办的铁路从业员养成所。该校继承自德占时期山东铁路公司开展的铁路职工培训。除此之外,日本人吉利平次郎开办的私立青岛学院商业科也于1917年开始招收中国学生,对青岛中国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职业教育培训。

日占青岛当局对德占时期成立的教会学校也进行了改造和利用。日占当局了解教会所属国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日益膨胀,所以对这些教会学校抱有相当大的戒心。这种互不信任影响到从事中国人教育的教会学校的办学。日占当局不仅要求部分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加上日语(礼贤中学的语言课程中就有德文及日语),甚至还会勒令教会学校停课。1919年,由于明德中学的学生响应五四爱国运动、张贴排日标语,明德中学的教员、校长、传教士等遭日军拘捕,学校被勒令停课一年,并被迫迁往潍县与文华中学合并,直至1920年秋才回迁青岛。这些干涉活动使得教会学校原先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德租日占时期青岛中国人教育对比

通过对德租青岛和第一次日占青岛这两个时期中国人教育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德日殖民当局政权主导下的教育活动,尽管都是为了殖民统治服务,但是形式、内容和产生的影响都有所不同。

(一)办学主体和学校类型有所不同。前文中已提到过,德占时期兴办青岛中国人教育的主

体分为两部分,一是德占当局,一是传教会;而日占时期兴办教育的主体则为日本守备军司令部。这使得不同的办学主体衍生出的教育体制、办学目的和教学内容也不尽相同。德占时期传教士兴办的学校具有私人办学的性质,教学目的与传播基督教教义有着密切联系。如柏林信义会从事女子教育的动机为“中国人(男尊女卑的思想)与基督教男女平等思想相对立,对妇女的普遍歧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完全无知和由此产生的家庭生活缺陷”^{[6]24}。同善会建立的淑范女中追求的目标则是进行礼仪教育,卫礼贤在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礼仪形成的根源在于对上帝的敬畏,因而礼仪教育是完成整个工作的目标。”^{[6]27}这些都体现了教会学校的办学目标及与传教事业的密切联系。这种以传教为目的设立的学校,其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都包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授课方式较为温和。日占时期由守备军司令部管理、设立的公学堂和语言学校,则属官办性质,目的是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课程中的“修身”,即对学生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无处不在的日语教育既是对中国青少年进行思想殖民的手段,也是为更好地奴役青岛中国人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二)办学质量和办学条件有所不同。德占时期由德国总督府和传教会设立的学校,建有专门校舍,涉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领域。且设置的课程多为近代科学课程,如地理、算术、几何、化学等。学校所聘请中德籍教师的学术水平也颇高。如建立于1907年的德华大学,德国教师“均是从胶澳总督府及其所属单位的德国官员或技术人员中选聘的,有的还是从德国国内聘请的,医科教师中包括海军医院的院长和各科主任医官,农林系的森林学课程由青岛森林局总办、政府顾问兼任”^{[6]35},汉人教习也多为“出身翰林、进士和举人之流的所谓饱学之士”^{[15]61}。这种较高的办学质量也在毕业生的去向上有所体现。同善会创立的美懿和淑范两所女校,截止到1914年41位毕业生中,“有17人后来从事教师工作,17人到其他地方继续接受教育(其中2人在德国)”^{[6]27}。而第一次日占时期作为青岛中国人主要教育场所是公学堂。公学堂是由德占时期的蒙养学堂改造而成,后来又增建一些。虽然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有了增加,但是其校舍条件、师资力量之差前文中亦有所提及,这种状况与当时日侨学校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明文规定作为日侨学校的青岛小

学校“应从各府州县选拔最优秀者充当教员”^{[16][113]}。公学堂不仅在办学条件上因陋就简,在授课内容上也偷工减料。总是尽量降低中国青少年的受教育年限,降低其地理、历史等方面的文化素质,使其达到可为其用的最低标准即可。

(三)教育影响和施教倾向有所不同。德占当局和传教会主导的青岛中国人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能接触到近代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教育,并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技术培训,中国人就学的热情较为高涨。这一过程培养了青岛最早一批具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也使得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得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于青岛而言,青岛地区出现了第一所近代新式大学,在原来新式小学、中学基础上出现高等教育,近代教育体系雏形展现。”^[17]而第一次日占时期,日占当局对德国原来在青岛举办的中国人教育事业采取限制措施,导致一些具备较好办学条件的教会学校的教学效果大受影响。其所创建的公学堂和语言学校对青岛中国人施行的教育内容也以奴化教育为主。以语言学校为例,其首先注重日语语言教育,其次注重商业教育,以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青岛进行经济掠夺的需要。对于工业技术,则对中国人极少传授^[18]。至于职业教育,更是只有公学堂内附设的实业学堂、铁路从业员养成所和兼收华人的私立青岛学院商科负责承担。这种差异源于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人教育方面,更加重视文化和宗教影响,其目的是促进中国人对德国文化的认同,培养拥护德国文化的信徒,教育不过是传教的手段。而日占青岛当局则是通过同化教育使中国人沦为服务其殖民政权的奴仆。

尽管德占当局和第一次日占当局在不同的文化政策指导下呈现出不同的教育活动形态,但从本质上来说,二者开展教育活动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通过文化教育手段传播本国文化,进而使殖民地人民听其摆布,为其在青岛进行的殖民统治服务。在这一点上,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如德占当局在创办德华大学的备忘录中写道:“如果不像现在这样,创造一个机构,在与中国政府保持十分融洽的关系的情况下,有计划地,遵循一定目的地向正在崛起的新中国大规模传播德国的精神生活并使之得到理解的话,那么迄今为止,德国(指私人方面)在东亚教育方面所花费的大量财力,便都会付诸东流。”^{[3][559]}这种将文化教育活动同

政治因素联系起来的作法,正是德占当局在青岛开展教育活动的真正意图。同时不同殖民当局在开展青岛中国人教育过程中对于本国语言教育的重视——不仅仅是日本,德占当局也曾专门设置语言学校教授青岛中国人德语,更是试图从语言、思想上对青岛中国人进行殖民控制。

四、结语

通过对比德租日占时期青岛中国人教育状况的不同,可以发现尽管都是殖民当局主导的殖民地教育,但是二者在具体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影响上还是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是不同的殖民文化政策主导下,殖民当局采取了不同的管控措施与行为。德国殖民当局在青岛兴办中国人教育的行为是在其文化政策指导下进行——“向中国大规模地传播德国精神”。通过在青岛推行一系列扩大德国文化在中国影响力的活动,从而培养喜爱德意志文化、熟悉德国工业产品的中国人才,进而扶植从政治和思想意识上亲近德国的中国未来一代领导层,最终目的是按照德国模式改造中国国家机构,从而有助于德国在与其他西方国家抢夺中国利益时占据优势。而第一次日占青岛时期,殖民当局发展中国人教育的目的则是通过日语教育同化统治下的中国人,削弱其反抗意识,使中国人甘愿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相比德国殖民当局通过教育将中国人培养成崇信西方宗教和文化的信徒,日占青岛当局则希望将中国人培养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奴隶,前者重视精神感化,后者强调政略建设施加影响。但是二者的殖民文化政策本质并无不同——都是使文化教育服务于对青岛殖民统治。

参考文献:

- [1] 刘善章,周荃. 中德关系史文丛[G].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1.
- [2] 翟广顺. 青岛教育史:1891—1949[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9.
- [3] 于新华. 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 [4] 袁荣叟. 教育志[M]//胶澳志:第七卷.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
- [5] 谋乐. 青岛全书[M]. 青岛:青岛印书局,1912.
- [6] 王镇. 德占时期青岛新式教育的发展[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8.
- [7] 柯伟林. 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M]. 陈谦平,

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8]青岛市档案馆.胶澳租借地经济与社会发展——1897—1914年档案史料选编[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9]姜万校,王锡銜.教育志[M]//青岛市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10]山本一生.青島の近代学校[M].东京:皓星社,2012.

[11]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青島ノ教育[M].青岛:青岛守备军民政部,1918.

[12]陆军省.青島军政史:自大正三年十一月至大正六年九月:第二卷[M].东京:陆军省,1917.

[13]山本一生,新保敦子.中华民国期山东省青島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日支事変」を中心に—[M].东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2014.

[14]齐红深.日本对华教育侵略——对日本侵华教育的研究与批判[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1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岛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青島文史资料:第5辑[M].青岛: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

[16]青岛民政署.新刊青島要覽[M].东京:岩松堂书店,1918.

[17]李勇.早期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以青島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为例[J].山东高等教育,2018(4).

[18]孙新兴.日本侵占青島时期殖民主义教育概观[C]//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12)——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北京: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2009.

Research on Colonial Education in Qingdao during the Periods of German and Japanese Occupation (1898–1922)

XIN Jiayi

(School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German occupation period and the first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in order to better carry out the colonial rule and economic plunder,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controlled and managed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Qingdao for the purpose of serving their aggressive activities. Howev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fferent cultural policies, the school-running forms, teaching content and influences were different. In the German occupation period, the governor's office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 mainly undertook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 education content involved religion, knowledg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nd vocational skills, which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ultural level in Qingdao. In the first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he colonial authority was the leader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Qingdao, using public schools and Japanese schools to carry out enslaving education for Chinese teenagers. Although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performed differen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fferent cultural policies, and caused the differences of results, their essence was to serve the colonial rule.

Key words: German occupation period;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Qingdao; coloni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雪 箫)